

ABOUT THE AUTHOR



趙炎秋 / 男（1953—）

湖南邵陽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湖南省優秀社科專家。湖南理工學院中文學院特聘教授，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湖南省文藝理論學會會長。著有《藝術視野下的文字與圖像關係研究》《中國狄更斯學術史研究》《形象詩學》《明清近代敘事思想》《狄更斯長篇小說研究》等專著 14 部，發表學術論文 200 多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1 項，一般項目和青年項目等 4 項，獲教育部人文社科獎二等獎二項，專著《藝術視野下的文字與圖像關係研究》曾入選國家社科文庫。

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建構必要性與可行性試探

趙炎秋

摘要：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指引下，加速建構、完善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可以從必要性與可行性兩個方面考察。從必要性的角度看，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是時代的要求，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發展的需要，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學需要的重要途徑。從可行性的角度看，對於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人民對豐富多彩的高質量文學作品的需求提供了民眾支持，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思想資源，黨和國家領導層的重視提供了重要支撐。

關鍵字：文學理論中國學派 建構 必要性 可行性

Exploring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ry Theory

ZHAO Yanqiu

Abstract: In this new era, it is required u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ry the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ry theory can be investigated from two aspects: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cess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ry theory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meet the growing literary needs of th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il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ry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has provided the social foundation, the people's demand for colorful and high-quality literary works has provided the public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attention of the Party and national leadership have provided an important support.

Key words: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 necessity; feasibility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的歷史經驗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ZDA278）。

馬克思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1] 從另一方面理解，馬克思的論述也包含了下面這層意思：當某一問題解決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已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這個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就是應該的也是必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巨大的社會需求和充要的物質與精神條件，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適當其時。

一、建構中國學派已經進入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發展重要議事日程

學派是學問或學術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派別。從形成的方式看，學派可以分為四種。一種是因為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學派，如中國古代的儒、墨、道、法等，均是因為出於同一師門且觀點相同而逐漸形成的，可以稱為師承性學派。一種是因為地域的原因而形成的學派，即同一地域（包括院校）的學者由於觀點相同、研究的內容大致一致而形成的學派。這種學派可以稱之為地域性學派，如西方經濟學界的芝加哥學派、瑞典學派等。一種是因為長期研究同一問題而形成的學派，這種學派可以稱為問題性學派，如我國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徽學、桂學等。一種是圍繞某一思想體系或核心觀點而形成的學派，這種學派可以稱為思想性學派。如果從學派的角度考察馬克思主義，應該可以稱為思想性學派。自然，四者的劃分並不是絕對的，四種學派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並不十分清楚，劃分只能是根據其主要的方面。^①

學派是學術成熟的標誌。理論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求形成自己的學派。中國文學理論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已經進入成熟的階段，但從學派的角度看，中國文學理論在這方面做得還有所不夠，相對比較文學等學科，文學理論中國學派這面旗幟迎風招展得還不夠，^② 離時代與民族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

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重視思想、理論領域中國學派的建構。早在 1938 年，毛澤東就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2] 這段論述實際上提出了中國學派的三大要素：符合中國國情、服務中國人民、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

① 參見陳吉生：《試論中國民族學的八桂學派》，《廣西社會科學》2008 年第 7 期。

②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問題，中國學界討論得比較充分，相關文章較多。如張曉紅：《文化自信的百年敘事：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回顧與展望》，《中國比較文學》2023 年第 2 期；李偉昉：《文化自信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創建》，《中國社會科學》2020 年第 5 期；曹順慶：《論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淵源》，《求是學刊》1995 年第 5 期等。

氣派。任何理論學派，如果要稱為“中國學派”，上述三大要素實際上是必不可少的。

鄧小平同樣強調中國學派的建構。1979年，《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他強調：“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鑽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的一切好的東西，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善的藝術形式。”“我們的藝術屬於人民。”文藝要“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3]這些論述，措詞雖然不同，但強調的仍是“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人民”、“社會生活”和中國社會。創造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少不了這些因素，創造新時代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當然也少不了這些因素。

進入新時代之後，習近平把中國學派的建構擺在了更優先的位置。《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強調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誌，是實力的象徵，也是自信的體現。……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習近平認為：“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脫離了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就不會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我國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堅持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樹立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聚焦人民實踐創造，自覺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繫在一起，努力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研究成果。”“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加強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分析研究，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4]習近平的這些論述，從不同方面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建構進行了闡述，包括建構原則、體系內容、中國特色、人民中心、主體性與創新性、立足中國現實等方面，這些方面也正是各種理論的中國學派所必備的品質。習近平的相關論述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原則指引。

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指引下，加速建構、完善文學理論中國學派。要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有必要厘清其與中國特色文學理論之間的關係。本文認為二

者之間有同一的一面。相對於國內其他非中國特色文學理論而言，它們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①相對於世界其他民族文學理論而言，它們是中國的文學理論。但從嚴格的角度考察，二者又不是完全同一的。中國學派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發展的新階段和新境界，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中的一個特殊學術派別。新階段新境界是指中國學派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新時段，是其成熟的表現形態，特殊表現形式是指中國學派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中圍繞中國性建構起來的成熟學術共同體。中國學派有自己的規定性。從地域的角度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是一個地域性學派，產生於中國這片土地，建構於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基礎之上；從思想的角度看，它又是一個思想性的學派，它是以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為貫穿紅線而形成、發展起來的。從與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關係來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指的是文學理論中具有中國視角和中國精神，以中國為立腳點、出發點和歸宿、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具有國際領先研究成果的學術共同體；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指的是以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為指導，在中國本土產生，吸收了中國文論與西方文論的全部精華，符合中國文學現實和中國人精神內核與審美習慣的文學理論的總和。中國學派強調的是理論的中國性，特色文論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的理論。我們可以說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卻不能說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是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前者在後者的範圍之內，但並不覆蓋後者的全部範圍。

二、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必要性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自 20 世紀初開始形成，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風格和氣派，但離有世界性影響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這主要表現在自身的體系還不十分完善，重要的有影響的創新性觀點還有所不夠，特色還不十分鮮明，社會存在度還有所不夠等方面。其原因從客觀上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先後受到西方、蘇聯然後又是西方文學思想的影響，在接受外來思想的過程中反思不夠，自己的定性未能很好地確立，特點的挖掘與突出不夠。從主觀方面看，則與文學理論界創新意識有所欠缺，重大的創新性成果不夠豐富，以及形成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學派的自覺意識不夠有關。這與當前中國的整體國際地位不符，離中國文化與文學發展的要求也有較大的距離。在 21 世紀 20 年代的今天，隨著社會的發展，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人民對於文學要求的提升等，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已經成為全國人民以及領導層和文學理論界的共識，時代的必然要求以及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發展的需要。這可以從三個方面探討。

^① 不是所有由中國人提出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思想都可納入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範圍。

1. 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是時代的要求

1978年之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加。就經濟來看，中國經濟總量1978年位居世界第十，到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一直維持至今；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由1978年的1.8%，到2012年提高到11.5%，2021年上升到18%。就社會發展來說，1979年的中國還是一個以農村、農業為主的國家，到2014年已經成為一個初步實現城市化的國家，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成為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到2023年，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6.1%，部分大中城市進入消費時代。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話語權提高，人民精神生活豐富多彩，民眾對於文學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儘快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推動中國文學和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發展以滿足中國人民日益提高的精神和審美需求，增強中國文學理論在國際文學理論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已經成為擺在中國全體文學理論工作者面前的時代必然要求。

學術之所以要建立學派，歸根結底還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這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從客觀方面看，學派與其誕生的社會、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一定的學派建立在一定的社會和文化的基礎之上，離開了社會和文化的土壤，學派即使建立起來，也會逐漸萎縮。從主觀方面來看，學派又與一定的思想、觀念與傳承相聯系，不同的學派的思想、觀念與傳承不同，其對於現實的看法與處理也有差異。現實是複雜的，需要從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進行理解與處理，這就需要有不同的學派。中華民族有自己的現實與文化，需要適應這種現實而產生的學派，只有在中華民族自己的現實與文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學派，才能更好地處理中國的問題，這是產生在他民族的現實與文化基礎上的學派所無法取代的。因此，中國學術需要自己的學派，中國的文學理論也需要自己的學派。只有建構起文學理論的中國學派，才能更好地處理、發展中國的文學和中國的文學理論，這同樣是其他民族的文學理論所無法替代的。

中國文學理論界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努力應該從1938年毛澤東提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相關論述的時候就開始了。但系統地進行建構則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上世紀5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一邊倒地 toward 蘇聯學習的傾向也得到糾正，中國文學理論界開始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1958年，毛澤東提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取代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同年8月，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做系列講座，第一講的題目就是《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也是這個月，他在河北省文藝理論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批評》。從1956年開始，延續到60年代初的全國美學大討論，學者們圍繞美的本質、美感、藝術和審美教育等核心問題進行爭論，形成了頗具特色的中國四大美學派別。^①這些講話與事件意味著從領導層到學術界，中國文藝界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的努力已經從自在進入自為階段。20世紀80年代後，隨

^① 即以蔡儀為代表的“客觀派”，以呂熒、高爾泰為代表的“主觀派”，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主客觀統一派”，以李澤厚為代表的“社會性與客觀性統一派”（80年代發展為“實踐美學派”）。

著改革開放的大規模開展和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國學術界正式提出了建構中國學派的要求。在文藝方面，首先從比較文學開始，哲學、藝術學、生態批評、闡釋學等學科都陸續提出了建立本學科中國流派的要求。^①這些要求與呼聲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有力地推動了學術領域中國學派的形成與發展，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也由此進入議事日程，成為中國文學理論的熱點之一。

2. 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發展的需要

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憑空發展，它總是在現實的基礎上，吸收已有的思想資料，依託一定的平臺建構與發展。依託的平臺不同，研究的對象，發展的方向，採用的方法，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文學理論一邊倒地學習蘇聯文論，在蘇聯文論的平臺上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由於缺乏中國視野，民族主體性突出不夠，緊扣中國現實不緊，未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成就有限。^②5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文學理論開始擺脫蘇聯文論的影響，走自己獨立的發展之路，初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理論體系。但由於極左思潮，和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的干擾，20世紀50、60年代中國的文學理論並沒有取得理應取得的結果。新時期之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民族意識隨著上漲，中國文學理論界逐漸意識到建構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體系的重要，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逐漸成為學界的共識，相關討論與文章不斷出現，到今天，中國學派已經基本形成，但還需做大做強。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形成，給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工作平臺，有利於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順利發展，促進其更具中國特色，更有中國標識。

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為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提供了新的凝集點。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特色、核心思想和問題領域。這些特色、思想與問題域構成了學派的規定性、形成了學派的理論凝集點。文學理論中國學派也有自己的特色、思想和問題域，有自己的理論凝集點。這些凝集點有的在中國學派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形成之後更加明顯，有的則是在中國學派形成之後才形成發展起來的。如何使中國的文學和文學理論更具中國特色，更貼近中國現實；如何提出原創性的重大觀點。這些問題在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形成之前或許不是特別引人注意，但中國學派形成之後就

① 如毛莉：《打造文藝理論和批評的中國學派》，《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16日第1版；李永傑、項江濤：《構建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4月25日2版；吳楠：《構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中國學派》，《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5月2日第2版；李永傑：《構建美學研究的中國學派》，《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1月19日第2版；汪樹東：《構建生態批評的中國學派——中國當代生態批評發展綜論》，《長江學術》，2023年第2期；李偉昉：《文化自信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創建》，《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9期；張清民：《文藝話語中國學派的模式和道路》，《中國文藝評論》2022年第6期等等。

② 也不僅文學理論，當時整個中國文藝都是如此。如1956年，中國動畫片《烏鴉為什麼是黑的》在意大利第八屆威尼斯國際兒童電影展覽會上獲兒童文藝影片一等獎，中國動畫界十分高興，但這部作品當時卻被誤認為是蘇聯導演創作的，說明中國動畫當時還未形成自己的特色。（見任占濤：《試探中國動畫造型的民族化之路：以國產動畫中的孫悟空形象為例》，《當代電影》2015年第8期，第171—173頁）

不可能忽視了。如重大創新的問題，在中國學派形成之前雖然重要，但在形成之後則更加重要。因為作為一個學派，總得有自己能夠在世界文學理論界拿得出手的東西，總得有能夠解決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發展中重大問題的方案，總得有“對歷史進步、人類探索有開拓性價值的理論原創性成果”。^①這就對重大創新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凝集點由此形成。圍繞這些凝集點，學者們進行研究，從而推動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發展。

中國學派也給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提供了新的推動力。理論的發展需要內在的動力。中國學派的形成給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這種動力。這種動力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學派的形成與發展需要全體成員的努力，這種努力必然推動學術的發展。二是學派形成之後要凝聚自己的問題、形成自己的特色、提出自己的創新，這些問題、特色和創新要求對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發展也會起到推動的作用。三是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必然更加關注理論的中國性，關注從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的現實提煉理論問題。這種關注將對文學理論起著一種引導的作用，為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一種新的動力。

3. 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學需要的重要途徑

文學的最終目標是服務人民，民族文學的最終目標主要是服務本民族的人民。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認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5]堅持文藝的人民本位，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是中國文藝的根本任務。

文學為人民服務，有三個重要方面。其一，人民對於文學的要求是多種多樣的，文藝應該滿足這種要求。習近平指出：“人民需要文藝。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隨著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人民對包括文藝作品在內的文化產品的品質、品位、風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5]高雅與通俗、陽剛與陰柔、嚴肅與幽默、精英與大眾，各種各樣的形式、風格、類型、題材、主題的作品都在人民要求的範圍之內，不可或缺。其二，中國文學的主要服務對象是中國人民，理應反映中國的自然與社會，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審美觀念、風土人情，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語言表達，有自己的作風和氣派。其三，中國文學還需要表現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的成果。習近平指出：“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

^① 高翔語。參見毛莉：《打造文藝理論和評論的中國學派》，《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16日第1版。

有文化傳統的血脈。”^[5]過去與現在，是人類發展的兩個階段，現在的人類與社會，是從過去的人類與社會發展過來的，過去的世界形塑著現在的世界，過去的人類形塑著現在的人類。民族的現在聯繫著民族的過去，中國的文學不僅要著眼現在，也要回望過去，表現中國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吸收其精華，將其融入自己的機體之中，成為自身的有機組成部分。

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有利於上述三個方面的實現。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最重要的特點，是強調理論的中國性，最終目的是建構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體系，推動中國文學健康發展。但理論的中國性並不只是一個口號，它需要落實到理論的各個方面。也就是說，要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必然圍繞“理論的中國性”這一核心建構起一個完整的高水準高質量的創新體系。這個體系必然要圍繞滿足人民豐富多彩的文學需要、表現歷史與現實的中國、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建構、展開。理論來自實踐，同時又要指導實踐。以中國性為核心的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必然會在以上各個方面深入發掘，形成系統的思想，從而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滿足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學需要，從一個重要的側面證明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三、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可行性

叩問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建構的必要性，實際上就是探討為什麼要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叩問建構的可行性，則是能否建構文學理論的中國學派。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學派表面上是學術共同體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實際上是在學派形成的客觀條件已經產生或者基本產生之後的水到渠成，學術共同體的努力只是輔助因素。而且學術共同體的努力也只是在這種努力成為必要的時候才會發生。從這個角度說，學派形成於它需要形成的時候。這個“需要形成的時候”也就是促進、支撐其形成的客觀條件已經產生或者基本產生的時候。從這個角度看，探討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建構的可行性時，要考慮的主要也是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否已經給它提供了充要的條件，答案同樣是肯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1. 中國社會的發展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社會基礎

任何學派，都是一定現實的理論歸納和表達。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類的任務包括理論、學說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正在生成的時候才會提出和生產；另一方面，當相關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正在生成的過程中時，與之相關的任務包括學說和理論也就會隨之產生，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這個角度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之所以是可行的，歸根結底是其產生與發展的社會條件已經形成。

這可以從三個方面考察。其一，是中國的發展已經達到新的高度。從經濟的角度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 20 世紀 80 年代相比，人均 GDP 在世界的排名也已大大提前。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在世界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的發展不僅需要而

且也已經能夠支撐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與發展。其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且具有自己的特點。經過 70 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無論是文明、文化、精神、思想，還是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風土人情都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具有自己的獨特之處。這些特色與獨特之處必然要求在文學和文學理論中表現出來，從而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另一支撐。其三，是中國文學的發展。現代中國文學產生於 19 和 20 世紀之交，五四時期基本形成，20 世紀 30、40 年代走向它的第一個高潮，50、60 年代形成第二個高潮，80 年代之後，進入第三個高潮。發展至今，中國文學已經蔚為大觀，精英文學、通俗文學、網路文學爭奇鬥豔，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各顯身手，虛構文學、非虛構文學、紀實文學各有千秋，人工智能創作也已登上前臺。作品品質也有較大提高。光是中國作協四大體制性獎項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每年都要推出不少優秀之作。文學的繁榮發展，一方面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提供了建構的文學基礎，一方面也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文學內部的動力。文學理論雖然有自己的獨立性，但歸根結底它還是有關文學的理論，中國文學的發展與繁榮，從思想、材料、特點等方面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支持，這是中國學派建構可行性的社會基礎的第三個方面。

2. 人民對豐富多彩的高質量文學作品的需求為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民眾支持

習近平指出：“人民需要文藝。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必須抓好經濟社會建設，增加社會的物質財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須抓好文化建設，增加社會的精神文化財富。物質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飯是最主要的，所以說‘民以食為天’。但是，這並不是說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無的，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最大區別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時時刻刻都存在。”^[5] 在這種需求中，對於文藝的需求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人民對於文藝的需求可以從三個方面探討。其一，人民對文藝的需求不是暫時的、時斷時續的而是永久的、無時不在的，與此相應，文藝創作也應持續進行，永不衰竭。其二，“隨著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人民對包括文藝作品在內的文化產品的品質、品位、風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5] 這種提高對於文藝工作者、文藝創作和文藝作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三，從文化水準、欣賞習慣和藝術素養等方面看，人民是分層次、群體的，不同層次、群體的民眾對於文藝的種類、層次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文藝創作必須在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種類展開，才能滿足不同層次、不同群體的民眾的文藝需要。

人民對於文學的需求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讀者的角度探討。中國文學的主要讀者自然主要是中國的民眾，中國的民眾有自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修養、思想情感、審美精神和文藝修養，讀者的這些特點一定程度地決定了中國文學的特點，決定了中國文學的中國特色。中國的意識流小說，比如王蒙的《布禮》《蝴蝶》《春之聲》《海的夢》等，除了具備歐美意識流

小說的一般特點之外，還具有自己的特色：故事的完整性、情節的連續性和思想的清晰性。這些特點與中國的文化文學傳統有關，也與中國讀者的審美習慣、欣賞習慣有關。讀者的規定性必然要影響到文學的規定性，中國讀者的規定性必然會一定程度地決定著中國文學的規定。

中國人民對於文學的需求，和中國民眾作為讀者的規定性，這兩個方面都要對中國文學產生影響，同時也會對中國文學理論產生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文學影響到建基其上文學理論，一是直接反映到文學理論的建設與發展中來。這必然會對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內容與形式產生重要影響，同時要求並促進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與發展；另一方面也會通過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影響到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的發展。

3. 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發展為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思想資源

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需要大量的思想資源，這些資源一方面是從中國的現實與歷史包括中國文學的現實與歷史中提煉，一方面是從各種已有的思想資源中借鑒。中國特色文學理論一百多年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思想資源，可以從三個方面支持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

其一，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可以在中國特色方面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提供思想資源。中國學派主要根基是中國，中國的現實與中國的文化。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是在中國的現實與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的，其發展過程中吸取了大量的中國因素，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這些中國因素與中國理論為中國學派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資源，可以為中國學派所吸收，成為其發展的基礎和內在的要素。

其二，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可以在理論觀點方面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提供思想資源。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完整系統的體系，思想內涵十分豐富。中國學派在建構的過程中，可以吸取其中對自己有用的東西。特色理論與中國學派具有較強的同質性，這種吸收應該是比較平順、順理成章的，不需要過多的轉換。

其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可以在處理與其他理論資源的關係方面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提供經驗。任何理論學派都不可能封閉發展，必然要吸收其他理論體系的有價值的思想與觀點。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與各種思想理論體系發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如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中國實際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吸收西方理論資源時要注意保持自己的主體性，要辯證吸取，不要倒向某一方面；處理與中國古代文論的關係時要根據現實需要適當取捨、古為今用，等等。這些經驗與教訓能夠為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借鑒，使其少走彎路，健康發展。

特色文論與中國學派之間有同質的一面，內涵有較大的重複與交叉，二者可以相互交流。但中國學派建構在後，範圍小於特色文論，因此在思想資源的借鑒方面，應該更多是中國學派借鑒特色文論，而不是相反。明確了這一點，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為文學理論中國學派提供了可行性，也就在邏輯之中了。

4. 黨和國家領導層的重視為中國學派的建構提供了重要支撐

對於理論與學術的中國學派，黨和國家領導層一直是重視與支持的。從毛澤東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2]到鄧小平的“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3]再到習近平的“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5]無不在強調建構理論與學術的中國學派。進入新時代之後，習近平總書記的許多重要論述對於中國學派的建構都起了重要的指導與推進作用。僅就習近平文化思想而言，他的許多思想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文化自信”“第二個結合”“明體達用、體用貫通”，以及他關於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指示，等等，都從宏觀的角度涉及到了理論與學術的中國學派的建構問題。這些思想對於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都有著重要的價值與作用，我們應該好好學習。

黨和國家各有關部門如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在建構理論與學術的中國學派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和部署。僅就國家社科辦主管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來看，早些年大都集中在盛世修史這一方面，近些年來理論創新方面的課題份額則有較大提升，其中文學理論方面的課題也有不少，很多涉及到文學理論中國學派建構的內容。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黨和國家的相關部門在建構理論與學術方面的中國學派方面所做的努力。黨和國家領導層主要是從頂層設計與宏觀規劃方面做出安排，不可能具體到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上來。但是這種頂層設計和宏觀規劃為廣大文藝理論工作者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形成了適宜的氛圍，支持激勵他們進行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工作。進入新時代以後，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實事求是地說，這與領導層的重視與支持是分不開的。

需要說明的是，從某個意義上說，建構文學理論中國學派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必要性為可行性提供基礎，可行性為必要性提供支撐；因為必要，所以可行，因為可行，所以必要，二者不能截然分開。但為了論述更加清楚，又有必要分別闡述，在閱讀時可以相互參照。

【參考文獻】

- [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 [2]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M]//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3]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M]//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2,209.
- [4]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5-19(2).
- [5]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10-15(2).